

原福州領事星

即慶者領銜

本日同往

惠玉

領銜。紀念

感不可言即誌。貴領事少隆中

外領通商民為領承。領銜

摘蓋一事此係為預防雅集館人致

成疾病起見

自是

傳

評

昌

丁巳



丁巳易評傳



丁 日 昌 评 传

邓亦兵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丁 日 昌 评 传

邓 亦 兵 编 写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澄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42印张105,000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册

ISBN 7—218—00177—7/K · 39

定价：1.30元



丁日昌 像

丁日昌评传序

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、走改革自强道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、富有革新精神的爱国政治家和实干家。

丁日昌以洋务活动蒙知于当局，受赞于时人。

“精思果力，熟悉洋务”——曾国藩；“洋务吏治，精能罕匹，足以干济时艰”——李鸿章；“果毅精明，不避嫌怨，近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”——沈葆楨；“李中堂能见其大，丁禹生能致其精，沈幼丹能尽其实”——郭嵩焘；“深明西学，熟谙洋务，几如烛照而计数”——《申报》。丁日昌在致力革新过程中，一再强调中国欲革新图强，必须有坚毅不挠，锲而不舍的精神。“洋人以利器为性命，以制造为功名，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，在数千百年，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。中土士大夫浅尝即弃，予之甚吝，而望之甚奢，小有訾訾则又引嫌远避，无肯以一身担当大利大害者。”

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首创者之一。于江南制造局、天津机器局的创办作出过重要的贡献，为经略台湾提出过积极的建言。在中国海军史

7-706/04

上第一次提出海军统一指挥分区设防的主张，建立新式的中国近代海军。在最为棘手的近代中外交涉问题上，丁日昌提出一系列主动进取的积极应变之外交主张。在朝野上下普遍对华侨采取鄙弃、漠视态度的情况下，丁日昌首先认识到华侨作用的重要和华侨问题的严重性，大胆提出遣使设领，保护华侨的建言，是开启中国近代侨务观念的前驱者。

丁日昌为达到革新图强之目的，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，除提出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之外，为培养必须的国外使才，制造通才交互使用派出去，请进来的办法，大力促成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，成功地吸收香港学生回内地培训，并为祖国服务。此外，丁日昌在整饬吏治方面，从关心民瘼、严以律己出发，提出各种严格的规范，并以“官须呵出，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，纵免刑章终造孽；民要持平，待看去个个流离颠沛，忍将膏血入私囊”为座右铭，起了表率的作用。

丁日昌致力革新图强的历程，是十分艰苦的，顺利成功者少，挫折难行者多。其阻力主要来自拥有巨大权势的中朝顽固派。所谓“日腾谤书，百出百变”是也！就今日观之，当可视为整个中国近代所经历进退顿挫的一项缩影。正因为

如此，丁日昌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，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，甚至连专门研究洋务运动的史学家同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

这次由丰顺县政协委员会和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“丁日昌思想学术讨论会”的成功，不仅为今后评价丁日昌开拓了途径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，特别是洋务运动的研究之转折点。今天，籍《丁日昌评传》出版的机会，向青年史学工作者邓亦兵小姐勇于大胆“闯关”的精神和劳绩表示敬意！

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：丁家骏

一九八六年十月写于曼谷

目 录

一、从书生到幕僚·····	(1)
二、应变局施展抱负·····	(9)
三、“螳臂当车”·····	(18)
四、严守条约办理交涉·····	(24)
五、盐务改革·····	(35)
六、赴潮州办案·····	(43)
七、首创轮船航运事业·····	(47)
八、除弊创新遭谤书·····	(60)
九、办理天津教案·····	(73)
十、引起轩然大波的奏折·····	(83)
十一、在福建·····	(90)
十二、对台湾的设施·····	(101)
十三、离职回乡·····	(110)
十四、评价·····	(122)
附：丁日昌年表·····	(127)

一 从书生到幕僚

一八二三年七月八日（道光三年六月一日），丁日昌诞生在广东省丰顺县汤坑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①。

丰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，西北有悬崖峭壁的贵人山，北部是奇峰插云的铜鼓嶂，南边有壁立万仞的飞泉岭，西有飞猿山，东是交椅山。汤坑乡在县中部，周围群山环抱，从北山嶂发源的北溪，是一条唯一的交通线，溪水流经汤坑乡，向南流经揭阳，由汕头入海。从地势看，汤坑是一个千山叠嶂的穷乡僻壤。

丁日昌，字雨生，亦字禹生，号持静，原籍嘉应州长乐县排岭乡。一六四六年十月，九军贼②攻下县城，丁氏始祖集众抵抗失败，带二子逃到潮州府丰顺县汤坑乡避难，后在汤坑安家。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三辈务农③。父亲丁贤拔“敬礼儒士，士穷无归者，必代谋馆谷，称意而去”④，有七个儿子，前妻袁氏生五子，丁日昌与其弟为继妻黄氏所生。

丁日昌八岁时，父亲送他到丰顺县太平寺，随三兄丁达夫读书。五年后，父亲去世，家里全靠母亲纺织为生。少年时期的丁日昌只得一边从事农业劳动，一边读书。贫寒的生活，使他从小就体验到下层人民的疾苦，对以后形成勤政爱民的作风，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一八四二年，丁日昌中秀才，第二年补廪生。这时李璋煜（字方赤）任惠潮嘉道，遍访“潮属勤学好古之士”⑤，潮州府教授冯奉初（字默斋）把丁日昌推荐给他。当他见到丁日昌的文章时，惊叹道：“不世才也！”⑥随延入幕府。李璋煜讲求经世之

学，“虑事精敏，明察而不迫，慈和而能断。”⑦在他的影响下，丁日昌以经史为根本，针对时势发表议论，他说，“致用本通经，乃可谓佳士”⑧，继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，对其以后崇尚西学，注重实际起了很大作用。

一八四〇年以来，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，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。从此，中国丧失了部分自主权。丁日昌的思想被这突变的形势触动了，他在《咏史》诗中写道：

“侥幸成名史册留，严颜数语竞千秋，眼看敌骑长驱入，漫说将军是断头。”

“太子南来壮气销，乍闻片语忽还镳。宋家待士何曾薄，竟有书生附北朝。”⑨

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，在不同时期，不同阶级，爱国主义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。丁日昌继承古代爱国主义精神，在读《宋史》中表示了热爱祖国，不愿投降的决心，这正是他以后坚持图强御侮，与外国人舌战争利的感情基础。

丁日昌在与潮州地方官僚的接触中，受到投身科举建立功名思想的影响，在这些人的资助下，他三次赴广州参加乡试，但都未考中⑩。于是，他放弃科举仕途，寻找新的出路。一八五四年，会党吴忠恕集众包围潮州城，丁日昌“募汤坑勇三百人，颇精悍，扎桥东宁波寺及韩山书院，守东路”⑪。潮州围解，丁日昌以军功得到了琼州府学训导的小官⑫。

一八五八年初，丁日昌怀着“意外遭逢天不弃”的兴奋心情，踏上了赴琼州的路程。在途中，他看见牛车就联想到困苦的人民，作《途中见牛车有感》诗，把人民比作牛：

“世人尽物力，不问性所宜，力耕受驱叱，负荷复靡羈……
造父善御马，不令马力疲，事当留余地，愚告君子听。”

行至岐岭，见农田一片荒芜，他恍然叹而：

圣人施恩泽，官吏重囊橐，民忧谁共忧，

民乐己同乐，休问监门图，吾且击吾铎。”

虽然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，但他对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，有一些客观的认识。他主张照顾百姓的利益，缓和阶级的矛盾，谴责官府把百姓当牛马，也许这就是他的“民为邦本”思想的基础。

这一年，英、法两国在美、俄等国的支持下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清政府在较量中又遭失败，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天津条约》。这使清政府陷入国内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势力入侵的内外交困境地。中国社会发生的急剧动荡的局面，促使许多不愿亡国的封建知识分子去探求拯救国家的方法。正在赴任途中的丁日昌，此时还是一个爱国的封建知识分子^⑬。他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心——广东，生长在最先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沿海地区，深为政局的恶化而忧虑。为了挽救国家，他在中国传统的史书中找不到理想的答案，而从宣传西方文明的书籍中，却获得了新的启示。他在《将之琼州留别诸知好》诗中写道：

“每看时局疑前史，偶得奇闻信异书。

便是闲官冷无事，当头明月不曾疏。”^⑭

他开始崇尚西学了。

一八五九年十月，丁日昌又以前边所说潮州军功升任江西万安县知县^⑮。当时的万安县经济衰败，社会混乱，有“私设厘卡扰商民；又有借助饷科派中饱者；诬从逆恐喝得钱者；持军需宿费滋累铺户者；结无籍游勇劫夺閭閻者”^⑯，词讼案件“约在百纸以外”。丁日昌接下这个烂摊子之后，选择了百姓最关心的词讼案下手整顿。他将所有“公牍旧卷，一概提入卧室，终日翻阅，为之别类分门。”在细心阅读的过程中，凡有疑问，或情节不符

等问题，他都记在纸上，以备审案时查问。经过一个月的调查、审理，全县状纸只剩“二三纸”。他发现有的差役从中勒索百姓，就明文规定：凡差役公差，一律“由官给盘川”，差役“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”，力图改变词讼中不合理的做法^{①7}。丁日昌在任只有三个月，就被调往广东办理洋务，离任时“百姓乞留不可得，解组日父老子弟设席作饯，秉香拥送者亿万人。”^{①8}这种叙述是夸张的，但丁日昌在万安县任，以干练的作风，为百姓办了一点好事也是事实。

一八六〇年十月，丁日昌改任江西庐陵县知县，仍以“清理积案至六十余起之多”^{①9}博得了勤政的名声。可好景不长，第二年四月，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吉安府境内，丁日昌与知府曾泳弃城逃跑，虽然又重新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城池^{②0}，但已构成失职罪，受到革职和追缴失去的公物的处罚。无奈，他流落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到扬州、山东、安徽，一路上写了许多诗篇，表达了“时艰报国难”的心情。九月，曾国藩督军夺取安庆，丁日昌上书条议吏治，随入曾国藩幕，当关卡卡员。后来曾国藩为了解决江西漕政的中饱问题，准备推行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减漕办法。丁日昌根据江西的情况，上书提出革除漕粮中饱弊病的办法。他的意见是：明定章程，清源节流，革除节寿礼和到任铺陈供设，添补器具各种杂费，办公设公费，上司“不向州县更索毫厘”，州县亦不得向下勒索，要“制备必需，革除无用，使吏胥无空可钻，无利可图”^{②1}，实际就是改旧章，立新法，结合实际推行胡林翼的办法。二次上书显示了初露锋芒的丁日昌有一种不甘因循的进取心，此后数十年的官场生涯，他就凭着这种力量，去实现他的抱负。入曾国藩幕不久，丁日昌就官复原职了。

在安庆，他结交了两个与他有着重要关系的人物，李鸿章（字少荃）和莫友芝（字子偲）。前者是后来提携他、支持他的上

司，后者是帮助他完成藏书目录，准备给他整理文集而终未如愿的朋友。

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，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，也使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成为不可抗拒的倾向。再也不能照旧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清朝统治阶级，为了求得自身生存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开始勾结帝国主义列强，共同对付太平天国起义。地主阶级的代表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，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，也开始学制洋枪、洋炮。这样，在地主阶级内部就分化出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。这时的丁日昌已成为他们中间的成员，从此就与洋务思潮、洋务运动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八六二年八、九月间，丁日昌被派到广东办厘金，后又调至高州昆焘营督办火器。他以自己的独特才能，在制造武器方面大显身手，先后“铸造大小礮三十六尊，大小礮炮子二千余颗。”^②在制造武器的过程中，丁日昌招募了香港工匠，仿造出西洋炸炮和炮弹。与此同时，率淮军乘英舰到达上海的李鸿章，命李善兰仿造洋炮，但因造出的洋炮成本太高，李鸿章转而上奏朝廷请派丁日昌来沪制造洋炮，还让人从香港购买机器。由于广东方面一再留用，丁日昌无法赴沪，李鸿章只好先派参将韩殿甲在沪设立炮局学制洋炮；丁日昌则让人把造好的洋枪洋炮运到上海，供李鸿章的淮军使用。

在广东，丁日昌认识了老乡黄达权（字平甫）。黄达权少年时在美国上学，精通外国语言文字，当时正在外国人理雅各处从事翻译工作，与理雅各新招聘的编辑苏州秀才王韬相识。王韬原在上海英国传教士所办的“墨海书馆”工作，后因上书太平军受到清政府通缉，在英国人的帮助下，逃往香港。与黄达权接触后，彼此感到看法一致，此后关系很好。一天，黄达权偶然与王韬谈起丁日昌，说他在广州“以西法鼓铸炸炮，运至江南击贼制胜”的

事情。王韬深为赞同，就对黄达权说：“今军事方棘，平贼要务首资利器，何不贡其所知”以助丁日昌。于是，王韬动员黄达权把自己所藏有关西方制造火器方面的书和图拿出来，准备翻译合著《火器略说》（亦称《火器说略》）上呈丁日昌^{②③}。此时丁日昌并不了解王韬，但王韬认为，丁日昌以西法制炮很合自己的思想，便想以《火器略说》一书献给丁日昌，从理论上帮助丁日昌学习制造西方武器，并以此求得丁日昌及有地位权势的官僚对他的了解和赏识，为他的理论主张找一条能付诸实践的出路。

一八六三年十月，丁日昌从广东来到上海，与正要赴广东按察使任的郭嵩焘（字伯琛，号筠仙）相遇。丁日昌拿出外国地图和译出的铸炮各书给郭嵩焘看，并谈及广东时局，使郭嵩焘“为之服膺无已。”^{②④}

到沪后，丁日昌又加入李鸿章幕府，主持建立了完全由中国工匠组成，使用泥炉及锉磨螺旋器具的炮局。以后，又有英国人马格里、知州刘佐禹综理，用蒸汽炉机为动力的炮局，合称三炮局。十二月十一日夜，丁日昌随李鹤章营攻打无锡，他“火燃三眼开花枪”轰城，为准军占领无锡立下战功。后来，王韬在《火器略说》序言中评论说：

“观察监制炮局，所制极精，命中及远，屡收其效，

军中号为飞炮。”^{②⑤}

事后，丁日昌经李鸿章推荐，补用直隶州知州^{②⑥}。丁日昌从此在官场步步高升，信心百倍地一展生平抱负。

①丁日昌自称：“余世居蓝田十图，本揭人也。”（《揭阳县续志》卷四，艺文）“我家在蓝田，时农复时士。”（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一）清乾隆三年设置丰顺县，揭阳县所属蓝田十图划入丰顺县。汤坑乡属金鼎寮，金鼎寮属蓝田十图。所以，按原建制，丁日昌也可以算作揭阳人。

②清顺治三年九月，揭阳武生刘公显与营卒吴元等聚兵霖田，号称九军贼。潘载和：《潮州府志略》第336页（台湾文海社版）。

③吕实强：《丁日昌与自强运动》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）称丁贤拔“营药肆”，民国《丰顺县志》“丁贤拔传”，李文田：《丁公行状》、温丹铭：《广东新通志列传稿丁日昌》等文，皆称其“世业农”，本文采后者说法。

④李文田：《丁公行状》，《碑传集三编》卷十四（台湾文海社版）。

⑤民国《潮州志》艺文，集部。

⑥温丹铭：《广东新通志列传稿丁日昌》，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》第二卷，第五期。

⑦同治《续扬州府志》卷八，宦绩。

⑧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一。

⑨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三。

⑩第一次在一八四六年，作《省旋述怀》诗。第二次在一八四九年。一八五九年赴琼州任时，作《移寓郑仙祠遣兴》诗，自注：“余十年前就试，曾寓于此”。第三次在一八五二年，有《下第作长歌寄蒋锦江明府》诗。一八五一年，未赴乡试，作《鉴湖兄将归省应试，以诗留别和韵即赠》诗。均见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一、二。

⑪《潮州志》大事记。

⑫李文田：《丁公行状》称：丁日昌任府学训导是一八五六年，这是错误的。丁日昌自述赴琼州上任的时间是一八五八年初（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三）。因为丁日昌不可能在一八五六年接命后，等了一年再赴任，所以他接旨时间应为一八五七年。

⑬王家璧在奏折附片中称：丁日昌“曾以诸生充洋行雇用，……故与洋人相习，及官知县，……”（《洋务运动》（一）第130页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）其他史料均无此类记载。笔者认为，丁日昌在这几年的活动都有史料记载，见本书所附年表，似无受雇洋行的事情，因此丁日昌在任官前，是封建知识分子，不是洋行雇员或洋行买办。

⑭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三。

⑮一种说法，丁日昌“纳资为知县”（《洋务运动》（八）第548页），其他史料记为“以守城功”为知县。丁日昌反对捐纳，家里又穷，似不可能纳资为知县。

⑯李文田：《丁公行状》，《碑传集三编》，卷十四。

⑰《抚吴公牍》卷十七，第7——10页。

⑱《万安县志》卷九。

⑲《宝丰斋类稿》卷五十六。

⑳同治《庐陵县志》卷十七。

㉑《求阙斋弟子记》卷二十八，第34页。

㉒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二十，第14页。

㉓王韬在《弢园文录外编》一书中，有时写《火器说略》，有时写《火器略说》，笔者认为二者实为一书，简证如下：

王韬在《弢园著述总目》的《火器略说》提要中称：“余于同治元年旅粤时，丰顺丁雨生中丞方以西法鼓铸炸炮，……余与黄君平甫译成是书。”又在《火器略说跋》中称“此书甫成时，中丞方有观察苏淞之命。”说明是书初写于一八六二年，成于一八六四年，作者王韬、黄达权。

王韬在《火器说略前序》中称：“庚辛之间……余以避兵来粤……识黄君平甫”，同译是书，成书时“贼所负，岷固抗者，金陵一隅耳。”说明是书的写作时间、作者、成书时间同上书，二书应为一书。

㉔《郭嵩焘日记》（二）第128页。

㉕《弢园文录外编》第223——224页。

㉖《李文忠公全集》奏稿卷五，第23，25页。